

## 朱熹

(西元一一三〇—一二〇〇)

王煥琛



自南宋以來七八百年間，中國教育可以說受朱子師道的影響最深最大。他繼承了孔子之大道，處處以身作則，教人「格物致知，實踐居敬」。他不僅是宋朝的一位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的偉大教師，同時他一生在儒學上的貢獻，真可說是孔子以後的第一人了。

—

朱子名熹，安徽婺源人，字晦菴，一字仲晦；又先後自稱晦翁、雲谷老人、滄洲病叟、隱翁。生於宋高宗建炎四年（西元一一三〇年），死於寧宗慶元六年（一二〇〇年），享年七十一歲。他死後諡為「文」，世稱「朱文公」，並曾歷受追封，從祀孔廟，為士人所景仰欽崇。他的父親名松，字喬年，號建齋，為人正直，對北宋周敦頤、張載、二程等人的哲學頗有研究；中進士後原在朝廷供職，因為不附和秦檜對金人屈辱的和議政策，被排擠外調到福建尤溪縣，朱子就在尤溪出生，所以他後來開創的學派又稱為閩學。

朱子幼時聰明。有一天，他的父親指著天，對他說「天也」，他接著問說「天之上何物」？他父親聽了，覺得不凡；就教他讀孝經。朱子讀了以後，即在書上題寫：「不若是，非人也。」

他幼年在父親指導下，養成勤奮好學的習慣，並且深受父親那種憎恨投降苟安的思想所薰陶，立下愛國報國的志願。十四歲時，父親去世，他依照父親的遺囑，向父執輩籍溪的胡憲（原仲），白水的劉勉之（致中），屏山的劉子翬（彥沖）三人求學，遵守遺訓，拜他們三人為老師。他們視朱熹為子姪；尤其是劉勉之，以女兒許配給他。他十八歲時中了鄉貢，十九歲便考取進士。

朱子考取進士之後，依然勤勉讀書，他在中年回憶起當時的情況說：「學者都不肯自去讀書，熹登科後要讀書，被人橫截直截，熹只是不管，一面自讀。」當時的儒生都以讀書作為科舉的手段，達到目的後，一般人便放下書不讀，去鑽營官職，但朱子不願同流合污，不管別人的嘲笑，一直埋頭研讀「論語」、「孟子」等經書，力求融會貫通，為以後注釋經書打下了基礎。特別是他以後所編著的「四書集注」，可以說是我國最有權威的一部教科書，其影響之大，實為中外教育史上所罕見的。

他二十二歲參加銓選考試，考取後被派到泉州同安縣當「主簿」，治績卓著，並且辦了一所規模頗大的縣學，他自己經常去講學。他求道心切，在二十四歲的時候，從同安徒步數百里，到延平縣拜李侗（愿中）為老師。李侗是程頤的四傳弟子，也是朱子父親的同學。那時李侗已是六十六歲的老人了，是位淡於名利的思想家，他隱居苦學了四十年，每天靜坐，以體驗人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的「氣象」。他把洛學加以精研貫通，從體驗中實踐出來。所以朱子見到李侗之後，便歎息說：「自我拜見

李老師以來，做學問才腳踏實地，才知以前研究佛老的學說都是錯誤的。」李侗對朱子非常器重，把自己一生的研究心得傳授於他。自此他不但承襲二程的洛學，並綜合了北宋各家哲學的思想，奠定了他一生學說的基礎。

朱子三十三歲那一年，升為文學博士。宋高宗死，孝宗繼位（一一六二），新皇帝下詔要士大夫對國家政治提出意見。朱子上書給孝宗，勸他重視儒家的「帝王之學」，摒棄佛家和道家的思想，從「格物、致知」做起，「意誠、心正」來學習古代聖人之道，就可以「治國、平天下」；同時極力反對同金人講和。他說：「今日之計，不過修政事攘夷狄。然計不時定者，講和之說疑之也。今敵於我不共戴天之仇，決不可和也。」他這種痛惡和議的見解，正和他父親不滿於秦檜的和議一樣。但是，當時的權貴如湯思遠等力主和議，排斥了朱熹的主張。結果孝宗未能重用他，只叫他擔任一名武學博士，實際上並無實職。一年多以後，朱子便申請回家去從事研究和講學。

此後十幾年的家居生活，他一方面著書立說，教授生徒；一方面結識許多學者，共同討論學問，其間曾有中國學術史上著名的「鵝湖之會」。

鵝湖山原名荷湖山，在江西鉛山縣北，山上有一座鵝湖寺，（後人乃在鵝湖寺立四賢堂，理宗淳祐年間，（即西元一二四一——一二五一，朱子死後始稱為文宗書院）「鵝湖之會」就是在這裏舉行的。其時朱子四十六歲（西元一二七五年），他的好友呂祖謙來探望他，講學於寒舍，兩個人合編近思錄。呂祖謙要走的時候，朱子送他一程。途中他們倆談到陸九淵的學術見解，朱子認為他的見解同

「中庸」所講的「思辨然後篤行」的宗旨相違背，表示不讚成。呂祖謙便提議邀請陸九齡、陸九淵兩兄弟回到鵝湖寺來討論。遂後在鵝湖寺上開會，討論了許多問題，但最主要的卻是教育方法，朱子的見解，認為指導學生讀書首先要「泛觀博覽，而後歸之約」；意思是說，先打下廣博的基礎知識，才能夠進行專門的研究。陸九淵不同意，認為應該「先發明人之本心，而後使之博覽」；意思是說，人的心靈本來具有先天的智慧，所以首先應該啟發他的靈感，等他的先天智慧充分展開了，才教他去廣泛地閱讀各方面的著作，加以分析研讀。

他們雙方對於教學方法的主張不同，因此在討論過程中彼此互相批評，朱子認為陸九淵把教學看得太簡單，祇要發展靈感悟性而不學習基礎知識，恐怕結果既感悟不出什麼東西而又弄到知識空虛，誤人子弟；而陸九淵卻批評朱子的教學方法是支離破碎，東讀一點西抄一點，雜湊起來的知識沒有多大價值。他還提出一個理由反駁朱子說：「堯舜以前的人，並沒有什麼書可讀，為什麼能夠明白許多事理？顯然是依靠自己的心性智慧的能動作用。」鵝湖之會的論爭誰也不能說服誰，結果雖不歡而散，但表現了朱子注重研究的精神，使朱子的學術聲望遠播。

朱子五十歲的時候，第二次擔任正式的地方官，朝廷派他到江西南康軍（軍，是宋代行政區域的名稱，和清代的「府」規模差不多）做知事。他在任四年左右，在政治上曾推行減輕老百姓役稅的政策，他一方面辦理平糶救濟，一方面以工代賑，興修水利，總算認真做了些事情。並重建廬山的白鹿洞書院（宋代四大書院，即白鹿、嵩陽、應天、嶽麓四大書院）（註一），對教育上有很大的影響。

朱子在南康的第三年，曾應詔上書——即有名的戊申封事，以忠實衛道者的立場對孝宗皇帝進言忠告。書文中有一「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」的句語，孝宗看了，認為這等於罵他心術不正和紀綱不立，勃然大怒。當時大臣趙雄對孝宗說：「這些書獸子無非沽名釣譽，如果皇上愈是責備他，他的名氣反而愈大，同他計較，反而助長他的聲勢，不如把他收容加以任用，慢慢再來收拾他。」孝宗聽了趙雄這番話，便派朱子到湘東主管茶鹽的事務。

朱子在孝宗傳位與光宗之後，曾奉派擔任福建漳州知府，在任約兩年。到他六十四歲，又出任湖南潭州（今長沙）知州，在任也是兩年左右。光宗死，寧宗繼位，朱子以六十六歲高齡，奉召擔任「煥章閣侍講」。朱子只當四十六天的侍講，對寧宗講解了「大學」，並編寫了講義給寧宗閱覽。當時韓侂胄把持政權，擴張私人勢力；朱子憂其擅權害政，警告寧宗提防他，遂觸侂胄之忌，任侍講僅四十六日即被罷免。並反對朱子的學派，大肆攻擊，妄指朱子的學術為「偽學」，稱朱子為「逆黨」；甚至誣陷朱子窺伺神器，主張刑斬以遏亂萌。這樣，朱學及朱子的同道就受了莫大的打擊，這就是所謂「慶元黨禍」。然而朱子卻不屈不撓，仍在竹林精舍怡然講學。一以闡揚大道為己任，其剛毅如此。慶元六年（西元一二〇〇年）三月，他於福建建陽考亭家，死在教學岡位上，享年七十有一。同年冬十一月葬於建陽縣唐石里的大林谷。

朱子的一生，從十九歲登進士，到七十一歲去世，這五十多年中，做官的時候共為十四年；惟因時逢衰亂，奸佞當道，或辭不就，或就亦無從遂其志。他在政治上的遭遇真可說是不幸。然而他在教育上的成就，卻是震爍千古，值得人們無限的景仰。

朱子死後，韓侂胄還不甘心，叫人到處造謠，說朱子的門徒將要利用送葬的機會，圖謀不軌；於是在出殯的時候到處戒嚴，如臨大敵，嚇唬他的學生。但是仍有毫不畏懼的朱子的追隨者或千人參加送葬的行列，可見朱子在他的學生心目中，是多麼受到崇拜敬仰啊！

他有一位學生名叫黃幹（字直卿，號勉齋），在所著朱子行狀中（註二），對老師一生誨人不倦的精神，作了如下的紀述：

「先生教人以大學、論、孟、中庸為入道之序，而後及諸經，以為不先乎大學，則無以提綱挈領，而盡論、孟之精微；不參以論、孟，則無以融會貫通，而極中庸之旨趣。然不會極於中庸，則又何以建立大本，經綸大經，而讀天下之書，論天下之事哉？其於讀書也，又必使之辨其音釋，正其章句，玩其辭，求其義，研精覃思，以究其所難知，平心易氣，以聽其所自得，然為己務實，辨別義利，毋自欺，謹其獨之戒，未嘗不三致意焉。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。」

「從遊之士，迭誦所習，以質其疑。意有未論，則委曲告之，而未嘗倦。問有未切，則反覆戒之，而未嘗隱。務學篤則喜見於言，進道難則憂形於色。講論經典，商略古今，率至夜半。雖疾病支離，至諸生問辨，則脫然沈疴之去體。一日不講學，則惕然常以為憂。」

「樞衣而來，遠自川蜀。文辭之傳，流及海外。至於荒裔，亦知慕其道，竊問其起居。窮鄉晚出，家蓄其書，私淑諸人者，不可勝數。先生既歿，學者傳其書，信其道者益眾，亦足以見理義之感人者深也。繼往聖將微之緒，啟前賢未發之機，辯諸儒之得失，闢異端之訛謬，明天理，正人心，事業之大，又孰有加於此者？至若天文、地志、律曆、兵機、亦皆洞究機微。文詞字畫，騷人才士，疲精竭神，常病其難，至先生未嘗用意，而亦皆動中規繩，可為世法。是非資稟之異，學行之篤，安能事事物物，各當其理，各造其極哉？學修而道立，德成而行尊，見之事業者又如此。」

由此可見，朱子之所以得到學生深深的愛戴，實在不是偶然的了。

從朱子一生的教育思想、言行中，更可顯示出他的偉大，茲分述如下：（註三）

（一）他認為教育的目的，主要在促使一般學者都能立志做聖賢。這種思想的背景，當然遠承孟子「人皆可以為堯、舜」，「堯、舜與人同耳」的啟示，近採濂溪「希聖、希賢」，伊川「聖人可學」，以及橫渠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」的主張。朱子曾說：「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。世人多以聖賢為高，而已別是一樣人，則早夜孜孜，別是分外事，不為亦可，為之亦可。然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；既與常人一同，又安得不以聖賢為己任？自開闢以來，生多少人，求其盡己者，千萬人中無一二。只是滾同枉過一世。」（語類）又說：「夫子之所志，顏子之所學，子思、孟子之所傳，皆是學也。」「學者要立志，纔學便要做聖人也。」「所謂學者，始乎為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也。」（語類）所以所謂教育，一言以蔽之，其目的在於培養聖賢。而培養聖賢

，必須使學者恢復本然之性與夫變化氣質之性。朱子在心性論中，曾把人性分為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。他說：「有天地之性，有氣質之性。天地之性，則太極本然之妙，萬殊之一本也。氣質之性，則二氣交運而生，一本而萬殊者也。」（語類）又說：「論天地之性，則專指理言。論氣質之性，則以理氣雜而言之。」（語類）又說：「以理言之，則無不全。以氣言之，則不能無偏。」（語類）「人性本善，只為嗜欲所迷，利害所逐，一齊昏了。」他在續近思錄中也說：「為學用力之初，正當學問思辨而利行之。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。」

「大凡人心若勤謹收拾，莫令放縱逐物，安有不得其正？若真個捉得緊，雖半月見驗可也。」他解釋大學所謂「明明德」，也說：「明德者，人之所得於天，而虛靈不昧，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。但為氣稟所拘，人欲所蔽，則有時而昏。然其本體之明，則未嘗息者。故學者當因其所發，而遂明之，以復其初也。」

由此可見，朱子認為教育的最高目的在於培養聖賢，而以聖賢自任者，應以「復性」「復初」及「道心主宰人心」為主要目標，也就是要養成完善無缺的人格。

（二）他教學的方法，認為教師應該誘導青年按下列五個步驟去努力，就是：「立志」，「堅毅」，「居敬」（用敬），「窮理」，（求知），和「實踐」。

朱子在語類中論及「立志」說：

「為學須先立志。志既立，則學問可次第著力。立志不定，終不濟事。」

「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，亦不難見。聖賢是真個去做。說正心，真要心正。說誠意，真要意誠。修身、齊家，皆非空言。今之學者，說正心，但將正心吟詠一餉；說誠意，又將誠意吟詠一餉；說修身，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諷勸而已。或掇拾言語，掇輯時文。如此為學，卻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？這裏須用著意理會。今之朋友，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，無他，只是心不立爾。」

「人之為學，至於有以自立其心，而不為物轉，則其日用之間，所以貫夫事物之中者，豈富貴所能淫，貧賤所能移，威武所能屈哉？」

這些都是朱子論立志的重要，同時他認為青年學子須以「聖賢」自任。

朱子又論「堅毅」說：

「為學要求把篙處著力。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，著力不放令倒，方是向進處。為學正如撐上水船：方平穩處，儘行不妨；及到灘脊急流之中，舟人來這一篙，不可放鬆，直須著力撐上，不得一步不緊。放退一步，則此船不得上矣。」

「且如項羽救趙，既渡，沈船破釜，持三日糧，示士必死，無還心。故能破秦。若瞻前顧後，便做不成。」

「進取得失之念放輕，卻將聖人格言處研窮考究。若悠悠地似做不做，如捕風捉影，有甚長進？今日是這個人，明日也是這個人。」

他用各種譬喻，說明我們的立志工夫是需要堅決與持久，勇往直前，切忌鬆弛懈怠。

再就「居敬」言之：「居敬」也就是「用敬」。朱子把「居敬」列入人生的重要修養方法，他曾說：

「人能存得敬，則是心湛然，天理燦然，無一分著力處，亦無一分不著力處。」（朱子全書卷二）  
「敬非是塊然兀坐，耳無所聞，目無所見，心無所思，則後謂之敬。只是有所畏謹，不敢放縱，如此則身心收斂。如有所畏，常常如此，氣象自別。」

由此看來，朱子所謂敬，是指主一無適，而所謂主一無適，是對於義理（或道德的至善）加以牢固的執著。換句話說，此心須經常為主宰，不拘在動在靜，不拘思慮云為，一切都須與義理相合，不容違背，這就是敬。

同時他認為居敬的工夫，除了上述「知」「行」兩方面的修養，還要不斷做到「存養」及「省察」兩大工夫。朱子說：「心只是一個心，非是以一個心治一個心。所謂存，所謂收，只是喚醒。」

「人惟有一心是主，要常常醒。」

「心若不存，一身便無所主宰。」

「學者常用提省此心，使如日之升，則群邪自息。他本是光明廣大，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，便了。不要苦著力，著力則反不是。」（朱子全書卷二）

「窮理」是朱子教導學生「求知」的方法，也就是格物、致知的實際法則。他認為：

第一，窮理務須週到、徹底。朱子說：「所謂窮理者，事事物物，各自有個事物的道理，窮之須要周盡。若見得一邊，不見一邊，便不該通。」又說：「格物二字最好。物，謂事物也。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，便有一個是，一個非。是底便行，非底便不行。「致知」，所以求為真知。真知，是要徹骨都見得透」。「致知、格物，十事格得九事通透，一事未通透，不妨。一事只格得九分，一分不透，最不可。」（朱子語類）

第二，窮理務須循序漸進，從切己處開始，逐漸推至疏遠處。朱子認為：「格物，須是從切己處理會去。待自家者已安疊，然後漸漸推去，這便是能格物。」「遇事接物（按即日常行事）之間各須一一去理會始得。……但隨事遇物，皆一一去窮極，自然分明。」

第三，窮理應以讀書為重要手段。朱子說：「窮理之要，必在於讀書。」我們講到義理之精微，常一時不易徹底理解，我們自非加詳盡精密的思辨不可。而書籍乃係古來聖賢用以講學義理、啟示後人的。所以我們果欲窮理，先窮書中之理，乃是最適當、最近便的道路。

第四，窮理應繼續用力，期能達到豁然貫通的境地。天下事物之理多至無窮，所以我們想以個人有限的時間與能力一一地來加以窮究，實為不可能的。因之，他認為格物或窮理，只要用力長久，今天格一件，明日格一件，日累月積，久則久之，我們對於天下萬理自會達到一旦豁然貫通的境界。他曾說：「天理在人，終有明處。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謂人合下便有此明德，雖為物欲掩蔽，然這些明明底道理未嘗泯絕。須從明處漸漸推將去，窮到是處，吾心亦自有滿則。」（朱子全書卷七）他又

在大學補述中說：「大學始教，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，以求至乎其極。至於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。此謂物格，此謂知之至也。」他這種豁然貫通說，當然是以他所主張的「性具萬理」以及「理一分殊」的理論做根據的。

關於「實踐」，朱子的學生黃幹在所撰朱子行狀裏面說：「其為學也，窮理以致其知，反躬以踐其實，居敬所以成始成終也。謂：致知不以敬，則昏惑紛擾，無以察義理之歸，躬行不以敬，則怠惰放肆，無以致義理之實。」朱子認為窮理之外，更主張踐實（即躬行實踐）及居敬為主要的修養工夫。他曾說：「大抵今日之弊，務講學者多關於踐履，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為無益。殊不知因踐履之實，以致講學之功，使所知益明，則所守日固，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，固不可同日而語矣。」「知與行工夫，須著並到。知之愈明，則行知愈篤，行之愈篤，則知之愈明。」（朱子全書卷三與卷七）由此可見，朱子認為，知而不行，即證明所知還淺，所知不夠透徹。他對於「踐實」與「力行」非常重視，決不如一般人所評論以為朱子崇尚空談，不重實行。朱子又說：「人之一身，應事接物，……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，則自近及遠，由粗至精，循循有序，而日有可見之功矣。」（朱子全書卷四）因此，我們可以這樣說：也許朱子學派的末流犯有「空談」這種錯誤，而朱子自己卻是一個最重實踐力行的思想家。

### 三

其次，我們再從朱子創辦白鹿洞書院的情形，來認識他的教育理想和教育方法。他以這所書院作為他自己的教育理想的實驗所，他自己親自兼任「山長」（即書院院長），釐定教育目的，訓練綱目，學習程序和修養守則等各種規程。這些規程就是我國教育史上著名的「白鹿洞書院學規」，茲將原文摘述於下：

（一）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

——右五教之目。堯使舜為司徒，敬敷五教，即此是也。學者學此而已，而其所以學之序亦五焉。其別如左：

（二）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

——右為學之序。學、問、思、辨四者，所以窮理也。若夫篤行之事，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，亦各有要。其別如左：

（三）言忠信，行篤敬，懲忿窒慾，遷善改過。

——右修身之要。

（四）正其誼，不謀其利。明其道，不計其功。

——右處事之要。

(五) 已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。

——右接物之要。

「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以教人為學之意，莫非使之講明義理，以修其身，然後推以及人；非徒欲其務記覽，為詞章，以釣聲名，取利祿而已也。今人之為學者，則既反是矣。然聖賢所以敬人之法，具存於經。有志之士，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。苟知理之當然，而責其身以必然，則夫規矩禁防之具，豈待他人設之，而後有所持循哉？近世於學有規，其待學者，為已淺矣。而其為法，又未必古人之意也。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，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，條例如右，而揭之楹間。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，而責之於身焉。則夫思慮云為之際，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，必有嚴於彼者矣。其有不然，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，則彼所謂規者，必將取之，故不得而略也。諸君其亦念之哉！」（朱子全書卷七十四）由此可見朱子特別注重「力行踐履」之教育。

白鹿洞書院學規的內容，可說概括了我國正統教育的精神，成為以後歷代教育的規範。正如明代顧憲成，在他的東林會約中曾說：「朱子白鹿洞書院的教條，實在是至善、至美了，讀書人要為聖賢，豈能越得出這個範圍，我們在東林書院所學的，也只是講明它的道理，而加以實行罷了。」其對後代之影響如此深長，朱子之所以成為正統教育家的代表人物，與他在白鹿洞書院的辦學理想和特別注重踐履力行的教育方法，是大有關係的。

朱子創辦白鹿洞書院，開南宋書院之先聲。他時常親自給學生上課，課餘還帶學生到山中風景美

麗的泉林散步，一邊觀賞，一邊討論學術問題。師生之間，其樂融融。

同時，從朱子的「大學章句序」中更可看出他的教育主張：

大學章句序：「大學之書，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。蓋自天降生民，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，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；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。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，出於其間，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，使之治而教之，以復其性。……三代之隆，其法浸備，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，莫不有學。人生八歲，則自王公以下，至於庶人之子弟，皆入小學；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，禮樂射御書數之文。及其十有五年，則自天下之元子眾子，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，與凡民之俊秀，皆入大學；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。此又學校之教，大小之節，所以分也。夫以學校之設，其廣如此。教之之術，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。而其所以為教，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，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。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。其學焉者，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，職分之所當為，而各俛焉，以盡其力。此古昔盛時，所以治隆於上，俗美於下，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。……若曲禮，少儀，內則，弟子職諸篇，固小學之支流餘裔，而此篇者，則因小學之成功，以著大學之明法，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，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。……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；則其書雖存，而知者鮮矣。自是以來，俗儒記誦詞章之習，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。異端虛無寂滅之教，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。其他權謀術數，一切以就功名之說；與夫百家眾技之流，所以惑世誣民，充塞仁義者，又紛然雜出乎其間。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；其小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。晦

盲否塞，反覆沈痼，以及五季之衰，而壞亂極矣。」

我們試將前述的「白鹿洞書院學規」和「大學章句序」，加以分析，更可見當時朱子的教育主張：

(一) 為什麼要有教育？因為人性本善，於氣稟不齊，以致性不能全，所以需要教育。

(二) 教育的本質是什麼？從本質上說，教育之所以為教育，就是「復性」。復性就是要完成「仁德」。「仁」是代表「心性」的全德。朱子認為「性包含著萬理」但其綱領只是仁、義、禮、智四德。仁是愛之理，義是宜之理，禮是恭敬之理，智是分別是非之理。（朱子全書卷四十七）因此所謂教育的本質乃是指不受氣質的拘束和人欲的蒙蔽，能夠把心性的全德，加以完全實現。

(三) 教育的目的是什麼？教育的目的是「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」，要人立志做聖賢。

(四) 應當由誰來擔任教育？應當由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擔任教育。

(五) 怎麼樣教？從制度方面講，分為小學和大學。從方法方面講，分為窮理和躬行。窮理的程序，分為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。躬行的要項，分為修身、處事和接物。

(六) 教什麼？從次第方面看，小學教的是「事」如：灑掃應對進退之節，禮樂射御書數之文。大學教的是「理」如：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。從德目方面看計分五教：「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」。

(七) 正當教育下的學生怎麼樣？接受正當教育的學生，都自覺的知道自己「性分之所固有，職分之所當為」，各自埋頭苦幹，努力學習。

(八) 那些是錯誤的教育？記誦詞章的俗儒之教；虛無寂寞的異端之教，以及權謀術數的功利之教，都是走入歧途的錯誤教育。

#### 四

朱子的一生，一方面盡瘁於教育，另一方面不斷進修研究，潛心著述，綜合了各家學說，開創了新的思想方法，留給我們博大的文化遺產。朱子不僅著作極多，而且他的著述態度，亦非常嚴謹。他曾說：「以前我用心良苦，思考一個道理，往往像過獨木橋一樣，相去雖在毫釐之間，但一失足，便有粉身碎骨的危險。」由於他對每一個小小的問題，都鄭重其事，不肯輕易放過，所以孜孜苦讀，未嘗一刻放鬆，因而得到的是既博大且精深的研究結晶。茲將其重要著作，列舉於下：

書名	卷數	書名	卷數
大學章句	一	論語集註	一〇
大學或問	二	論孟精義	論語二〇、孟子一四
中庸章句	一	孟子集注	七
中庸或問	三	周易本義	一二
中庸輯略	二	易學啟蒙	四（一說朱子指畫、 蔡元定撰）
論語綱領	一		

書集傳	六（蔡沈補成）	程氏遺書（二程遺書）	二五
詩集傳	八	程氏遺書附錄	一
儀禮經傳通解	正三七黃揚補成 、續二九	程氏外書（二程外書）	一二
古今家祭禮	二〇	延平答問	一
家禮（疑）	二	近思錄	一四（呂東萊合撰）
孝經刊誤	一	玉山講義	一
小學	六（朱子指畫、 劉子澄撰）	白鹿祠書院招示 記疑	一
楚辭集注	八	雜學辨	一
楚辭後語	六	周易參同奏考異	一
楚辭辯證	二	陰符經注	一
太極圖說解	一	韓文考異	一〇
道書解	二	感興詩	一
正蒙解	二	資治通鑑綱目	五九
伊洛淵源錄	一六	八朝名臣言行錄	前編一〇、後編一四
		論語要義（散佚）	未詳

論語訓蒙口義（散佚）

未詳

論語略解（未刊）

未詳

孟子要略（散佚）

五

論語或問（未刊）

二〇

國學恐聞編（散佚）

未詳

孟子或問（未刊）

一〇

此外後世學者所輯錄的關於朱子的著作如下：

書名	卷數	書名	卷數
朱子大全集	一二一	朱子錄要	一五
朱子全集	六六	朱子大全私抄	一二
朱子經濟文衡類編	七六	朱子心學錄	七
朱子學的	二	朱子語錄四纂	五
朱子文語纂編	一四	朱子語錄纂略	八
參訂朱子語類	二五	朱子晚年全論	八
晦庵文鈔	六	朱子文集纂	三二
朱子書節要	二〇	朱子五種語類	八〇
朱子語錄類要	一八	朱子書抄略	三
文公先生經世大訓	一六	朱子禮纂	五
朱子語略	一〇	朱子文集	一八

朱子學歸

二二二

朱子語類纂

一三

朱子論定文抄

二二一

朱子遺書

一〇六

總之，朱子每一方面的影響，在我國文化上都是非常重要而深遠的。他的四書集注，成為中國思想上的聖經；他的窮理學說，成為宋明理學的靈魂；他的白鹿洞書院學規，成為此後七八百年來教育思潮的濫觴。有人曾把他比之於西方哲學家康德（Immanuel Kant）；因為沒有康德，西洋近代的哲學必然改觀；沒有朱子，東方的我國宋、元、明、清七、八百年的儒家思想亦將缺乏重心。的確，我國教育史上，能直追孔孟的，可說只有朱子一人而已。

附註：

一：白鹿祠在江西廬山五峰下，唐代李渤、李涉兄弟在山上讀書，養了一隻白鹿為伴，因此得名。宋初在這裏辦了一院書院，後來停辦了，院舍都破殘不堪。朱子在南康軍任內，發起重建白鹿洞書院。他親自兼任「山長」講學。

二：黃幹（勉齋）所撰朱子的行狀：

「其為寫也，窮理以致知，反躬以踐其實，居敬所以成始成終也。謂：致知不以敬，則昏惑紛擾，無以察義之歸；躬行不以敬，則怠惰放肆，無以致義理之實。持敬之方，莫先生一。既為之箴以自警，又筆之書，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。終日儼然，端坐一室，討論典訓，未嘗少輟。自吾一心一身，以至萬事萬物，莫不有理。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，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。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己其與所以然而不可易。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，未嘗不反之於身也。不睹不聞之前，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。隱微幽獨之際，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。思慮未萌，而知覺不昧；事物相接，而品節不差。無所容乎人欲之私，而有以全乎

天理之正。不安於偏見，不急於小成，而道之正統在是矣。其為道也，有太極而陰陽分，有陰陽而五行具，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，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。天所賦為命，人所受為性。感於物為情，統性情為心。根於性則為仁、義、禮、智之德，發於情則為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之端，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，見於事則為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之常。求諸人，則人之理不異於己；參諸物，則物之理不異於人。貫徹古今，充塞宇宙，無一息之間斷，無一毫之空闕。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，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。先生之於道，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聖賢而無疑矣。故其得於己而為德也，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，盡性情之妙，達聖賢之蘊；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，備事物之理，任綱常之責。明足以察其微，剛足以任其重，守足以致其廣，毅足以極其常。其存之虛而靜，其發之也果而確，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，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。本未精粗，不見其或遺；表裏初終，不見其或異。至其養深積厚，矜持者純熟，嚴厲者和平，心不待操而存，義不待索而精，猶以為義理無窮，歲月有限，常歉然有不足之意，蓋有日新又新，不能自己者，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。其閒居也未明而起，深衣、幅巾、方履、拜於家廟以及先聖。退坐書室，几案必正，書籍器用必整。其飲食也，羹食行列有定位，匕箸舉措有定所。倦而休也，瞑目端坐；休而起也，整步徐行。中夜而寢，既寢而悟，則攤衾而坐，或至達旦。威儀容止之則，自少至老，祁寒盛暑，造次顛沛，未嘗有須臾之離也。行於家者，奉親極其孝，撫下極其慈，閨庭之間，內外斬斬，恩義之篤，怡怡如也。其祭祀也，事無纖鉅，必誠必敬，小不如儀，則終日不樂，已祭無違禮，則油然而喜。死喪之禮，哀感備至，飲食衰絰，名稱其情。賓客往來，無不延遇，稱家有無，常盡其歡。於親故，雖疏遠必致其憂；於鄉閭，雖微賤必致其恭。吉凶慶弔，禮無所遺；調恤問遺，恩無所闕。其自奉則衣取蔽體，食取充腹，居止取足以蔽風雨，人不能堪，而處之裕如也。若其措諸諸事業，則州縣之設施，立朝之言論，經綸規畫，正大宏偉，亦可概見。雖達而行道，不能施之一時，然退而明道，足以傳之萬代。謂聖賢道統之傳，散在方策，聖經之旨不明，則道統之傳斯晦。於是竭其精力，以研窮聖賢之經訓。於大

學、中庸，則補其闕遺，別其次第；綱領條目，燦然復明。於論語、孟子，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，便讀而味之者，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。於易與詩，則求其本義，攻其末失，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。凡數經者，見之傳注，其關於天命之微，人心之奧，入德之門，造道之域者，既已極深研幾，探頤索隱，發其旨趣而無遺矣。至於一字未妥，一辭未備，亦必沈潛反復，或達旦不寐，或累日不倦，以求至當而後已。故章旨字義，至微至細，莫不理明辭順，易知易行。於書，則疑今文之艱澀，反不若古文之平易。於春秋，則疑聖心之正大，決不類傳注之穿鑿。於禮，則病王安石廢罷禮儀，而傳記獨存。於樂，則憫後世律尺既亡，而清濁無據。是數經者，亦嘗討論本末，雖未能著為成書，然其大者固已獨得之矣。若歷代史記，則又考論西周以來，至於五代，取司馬溫公編年之書，繩以春秋紀事之法，綱舉而不繁，目張而不紊，國家之理亂，君臣之得失，如指諸掌。周、程、邵、張之書，所以繼孔聖道統之傳，歷時未久，微言大義，鬱而不彰，為之哀集發明，而後得以盛行於世。太極、先天二圖，精微廣博，不可涯涘，為之解剝條畫，而後天地本原，聖賢蘊奧，不至於泯滅。程、張門人祖述其學，所得有深淺。所見有疏密，先生既為之區別，以悉取夫其長。至或識見小偏，流於異端者，亦必研窮剖析，而不沒其所短。南軒，張公（栻），東萊呂公（祖濂），同出其時，先生以其志同道合，樂與之友，至或識見少異，亦必講磨辯難，以一其歸。至若求道而過者，病傳注誦習之煩，以為不立文字，可以識心見性，不假修為，可以造道入德，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，借儒者之言，以文佛老之說。學者利其簡便，託誓聖賢，捐弁經典，猖狂叫囂，僻僻固陋，自以為悟。（按指陸象山之心學，即所謂「江西頓悟之說」）立論愈下者，則又崇獎漢、唐，比附三代，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。（按指陳龍川之學說，即所謂「永康功利之說」）二說並立，高者陷於空無，下者溺於翳陋，其害豈淺鮮哉？先生力排之，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，於是學者靡然向之。先生教人以大學、論、孟、中庸為入道之序，而後及諸經，以為不先乎大學，則無以提綱挈領，而盡論、孟之精微；不參以論、孟，則無以融會貫通，而極中庸之旨趣。然不會其極於中庸、則又何以建立大本，經綸大經，而讀

天下之書，論天下之事哉？其於讀書也，又必使之辨其音釋，正其章句，玩其辭，求其義，精研覃思，以究其所難知，平心易氣，以聽其所自得，然為己務實，辨別義利，毋自欺，謹其獨之戒，未嘗不三致意焉。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。從遊之士，迭誦所習，以質其疑。意有未諭，則委曲告之，而未嘗倦。問有未切，則反覆戒之，而未嘗隱。務學篤則喜見於言，進道難則憂形於色。講論經典，商略古今，率至夜半。雖疏病支離，至諸生問辨，則脫然沉疴之去體。一旦不講學，則惕然常以為憂。樞衣而來，遠自川蜀。文辭之傳，流及海外。至於荒裔，亦知慕其道，竊問其起居。窮鄉晚出，家蓄其書，私淑諸人者，不可勝數。先生既沒，學者傳其書，信其道者益眾，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也。繼往聖將微之緒，啟前賢未發之機，辯諸儒之得失，闢異端之訛謬，明天理，正人心，事業之大，又孰有加於此者？至若天文、地志、律曆、兵機，亦皆洞究機微。文詞字畫，騷人才士，疲精竭神，常病其難，至先生未嘗用意，而亦皆動中規繩，可為世法。是非姿稟之異，學行之篤，安能事事物物，各當其理，各造其極哉？學修而道立，德成而行尊，見之事業者又如此。」